

# 追忆同于蓝阿姨交往的点点滴滴 2



托儿所时代的小白（右为作者）和新新 于蓝长子

四合院，有着传统景观的石狮、影背、假山和长廊，还种有老北京常见的枣树、爬山虎、美人蕉和指甲草。院里当时住的大多是“东影”时期的老领导、老邻居，最里院住着共和国首任中央电影局长袁牧之和陈波儿夫妇，后院住着“北影”首任厂长田方和于蓝夫妇，中院的东厢房里住着的是后来“新影”厂长的钱筱璋和张建珍夫妇，西厢房住着我们家……

当时于蓝阿姨的长子新新和我都是北影托儿所中班的孩子。为了接送方便，周一早晨大都由田奶奶带着新新和我乘着双人黄包车到托儿所去，周六下午又多是爷爷把我俩用车接回来，偶尔也有过于蓝阿姨或母亲接送的时候。

小时候，我记忆中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里院的陈波儿阿姨的不幸逝世。在1951年底追悼会上邓颖超同志宣读悼词，于蓝、侯波、张建珍以及母亲等八位女干部作为人民艺术家陈波儿的生前好友守护灵柩。也许是曾经的革命引路人和老邻居，也许是守灵者中的七位来自于抗战年代只有她出身于解放战争而尤为激动和伤感吧，我也跟着哭了。于蓝阿姨曾为此安慰沉浸在悲哀中的母亲和小小的我，鞠躬尽瘁这也就是搞革命所需要付出的牺牲和代价吧……

记得当时人们还来不及擦干眼泪就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了。我太小了并不了解父辈们的感受，认为大人的

哭泣就和孩子的伤心一样，长大了以后才真切地感悟到悲痛不只是感情的宣泄也是一种力量一只号角，它可以呼唤起更多人去努力奋进、追寻光明。

母亲晚年曾感慨地说过，她最早接触革命的大多是穿着简陋军装操着浓重乡音的军人，他们视死如归；而后来接触到了陈波儿、于蓝、侯波等来自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后，炯炯有神的目光，温文尔雅的谈吐、神采飘逸的潇洒、乐观向上的激情、以至于袁牧之、田方他们在朝霞中披着大衣的剪影都曾让母亲有了不一样的兴奋与感动，懂得了革命不仅有武装斗争的需要更有对美好事物的憧憬，她从此坚定地走进了队伍，和同志们有了共同的信仰以及说不完的心里话。

我小时曾有过三个名字，刚出生叫“长佰”，“东影”时叫“长白”，进北京后又叫“小白”，而两次改名居然同于蓝阿姨有关系。

我家有着少为人知的奇特且坎坷，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写一本故事。爷爷家境贫寒目不识丁，年纪轻轻就被骗到俄国做华工直到十七年后才回到了祖国，苦难与命运把他同敖德萨的俄国姑娘菲妮亚紧紧地连在一起了。他有过俄国十月革命红军的短暂经历曾在哈尔滨被北洋政府以“赤俄间谍”下过狱，后来流落到长春奶奶又被日本宪警毒打致疯，我的出生对于这个颠沛流离惨淡经营的家意味着命根子。爷

爷打了个“长命锁”，求来了“王长佰”的名字，祈求长命百岁吉祥安康。

兴山组织生活会上有人说我的名字有封建色彩，吃不准汉语的母亲吃只好求助训练班指导员的于蓝和照相股长的侯波，她俩索性偷梁换柱地把“长佰”改成了字音相似的“长白”，而我就叫王长白了。

1950年南下北京进了电影局托儿所，阿姨说我的名字太老气了，热心的邻居于蓝阿姨讲，田方在兴山时就总说我像个皮肤白白的洋娃娃，大家都觉得叫“小白”挺合适，从此直到小学毕业我就叫王小白了。有些顽固的爷爷对改名极不愿意，但也只好“随行就市”了。

在宝禅寺的那几年里也许因为有于蓝阿姨、好友新新以及田方伯伯，曾让我留下了许多童年的美好记忆，印象最深的算是过春节了。

除夕夜讨压岁钱——每每除夕钟声到来之际，我和新新为首的孩子各自抱着空饼干桶走进各家去作揖，那时于蓝阿姨总会在红纸袋里多放一点钱，还

把五光十色的糖果塞满了我的饼干桶，母亲也会同样回报给新新。那装满了糖果的饼干桶，可以吃上一个春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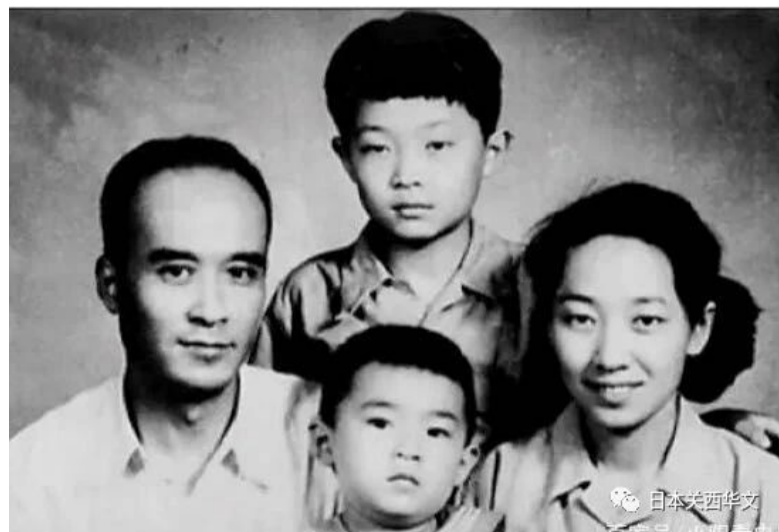
正月初一拜大年——新年早上袁牧之、田方、钱筱璋代表中央电影局、“北影”同大家团拜，给年长的田奶奶和我爷爷送来祝福和寿桃；于蓝阿姨会领着新新和我在后院里放礼花。岁月已过去了许久，但当年那寿桃上淡淡的粉色和夜空里腾起的火焰还有着依稀记忆。

春节期间逛庙会——每年春节，爷爷总是要带着我、新新到护国寺逛庙会，于蓝阿姨还准备了水壶塞给爷爷一点零钱，也许小孩子总要花钱吧。我们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用稚嫩的眼睛、耳朵、嘴巴以及童心去阅读着春节——中华文明关于“年”的教科书。

1953年秋，平静的童年生活激起了涟漪，那天从托儿所回来看到院子里熙熙攘攘地挤满了人，后来才知道钱筱璋夫妇以及父亲已被调到刚组建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工作。记得那天，袁牧之伯伯、



作者（童年时代）同父母合影



于蓝阿姨全家合影（后立者新新、中间者壮壮）